

唐诗研究系列



中国新时期 唐诗研究述评

ZHONGGUO XINSHIQI TANGSHI YANJIU SHUPING

张忠纲 吴怀东 著
赵睿才 綦 维

安徽大学出版社

2202.22

Z311.1

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

张其成 吴怀东

赵其成 吴怀东 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张忠纲等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1

ISBN 7-81052-309-0

I. 中… II. 张… III. 唐诗-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G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8005 号

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

张忠纲 吴怀东 赵睿才 慕维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码 230039)	印刷	中国科技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发行部 0551-5107784	照排	合肥市女娲照排中心
责任编辑	高兴	开本	850×1168 1/32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张	14 字 数 301 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数	1500 册
		版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1052-309-0/I·29 定价 19.6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引 言

站在世纪乃至千年的分水岭上,天风浩荡,游目骋怀,无疑会使人感慨万千。“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回顾曾经走过的道路,我们将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世纪像本世纪这样,发生过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道路迂回曲折,同时又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可阻挡的向前迈进的趋势。

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同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的20世纪可以说是科学普及的世纪,方法更近科学,认识更趋全面。在上半个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全面展开,学术研究告别了古典经学注疏模式,逐渐建立起现代学术规范。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半个世纪,由于受整个政治、文化大气候的左右与影响,当代学术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巨大的曲折,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段落:1949年至1966年可算一个段落,为转型期,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学术规范;1966年至1978年为一个段落,为变异期;从1978年至今为一个段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吸收传统学术的优长,借鉴现代外国科学的成分,形成了科学的学术规范,学术研究出现了全面的繁荣。

唐代无疑是至今仍令我们引以自豪的中华文明史上的辉煌时期,幸运而颇为巧合的是中国古典诗歌此时也趋于全面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诗的异彩华章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构成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现在仍不失其精神的魅力,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因此,唐诗研究不仅具有巨大的学术研究

价值,而且是当代大众文化消费和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唐诗研究与时代文化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走势自然是同步的。

建国后的第一阶段,学术研究强调必须自觉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学者专家都试图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古典文学遗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唐诗研究领域而言,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7年间,共出版各类唐诗研究著作百种左右。学术界先后开展了关于“盛唐气象”问题,关于唐代边塞诗评价问题,关于《长恨歌》以及李、杨爱情问题,关于唐诗繁荣兴盛原因问题的学术讨论,甚至对孟浩然及其《春晓》诗都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而在有关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古代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古典文学中的爱国主义问题、“中间作品”及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问题、古代山水诗及文学共鸣问题等的学术讨论中,也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唐诗及唐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在对待文学遗产问题上,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教条化的理解,学术研究和价值评判相混淆,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功利思想逐渐代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在“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方面过分地强调“批判”,出现了“左”的倾向。建国初期,即显露出强调批判、忽视继承的苗头,如《文艺生活》杂志新5号刊登《评冯至〈杜甫的家世和出身〉》一文云:“至于杜甫,在中国旧社会里,固然被推为诗圣,但是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主义的思想。”1954年冬开始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稍后开展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及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学术思想方面的问题采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而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1958年更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

随之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许多老专家的学术观点受到批判。有关“盛唐气象”问题的讨论就是意味深长而又引人深思的。“盛唐气象”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林庚在《诗人李白》(载1954年10月1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25期)一文中提出的,而最先对林庚的观点提出商榷的,是他的学生裴斐的《谈李白的诗歌》(载1955年11月13日、2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79、80期)一文,后来有人出来调和二人的观点,但双方都不同意这种调和。当时的争论还纯是学术争鸣,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是心平气和的。但到1958年情况就有了变化,这年《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又发表了林庚的《盛唐气象》一文,重申自己的观点,强调指出“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但《北京大学学报》立即又发表了3篇“批判”文章,立论和措辞颇多武断,已经没有了学术讨论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是“大跃进”的调子。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和傅庚生的《杜甫诗论》等也都遭到了批判。而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及其作品更被全盘否定。后来为了纠正这种贬低和否定文学遗产的“左”的倾向,何其芳在1959年6月提出了“中间作品”的问题,他说:“在文学史上,在同情人民和反对人民之间,在明显的进步和明显的反动之间,还有大量带有中间性的作品。它们并没有表现出反对人民,但其中也找不到同情人民的内容。它们并不反动,但进步意义也不明显。像王维、孟浩然的许多山水诗和田园诗,李贺、李商隐和杜牧的许多诗……大致就是这样的作品。”但在关于“中间作品”的讨论中,有的文章仍然认为孟浩然脍炙人口的《春晓》“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吸取的有益的东西”。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1962年在全国开展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活动,发表了约计三四百篇论文,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3辑《杜甫研究论文集》。虽然从1962年到1964年开展了关于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但由

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在批判继承问题上“左”的观点和思潮更加泛滥,甚至出现了“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口号(参见1964年6月21《光明日报》载《正确看待优秀文学遗产中的民主性精华》一文),古典文学作品几乎都被视为“封建主义文学”而被“批判”。总之,17年的唐诗研究范围不广,深度不够,解决的问题不多,局限性较大,“左”的干扰愈来愈严重。有关唐诗的几次学术讨论都没有深入下去,甚至不了了之,这些讨论等到1978年以后又重新被提起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7年中,五四以来现代唐诗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试图建立新的学术规范的努力没有取得良好的结果。

“文革”十年,极“左”思潮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学术完全听命于实用政治,学术研究失去了学术性和科学性,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这时期出版的唯一可以称得上是唐诗研究著作的,就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文革”后期,在“批儒评法”运动中,唐代所谓的“法家”文学家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颇受青睐,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整理出版了几十种有关著作,多为诗文选注。

1976年“文革”结束。特别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唐诗研究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术研究与政治被自觉地区分开来,学术研究从而摆脱了思想束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间,共出版各类有关唐诗的著作近千种,其中还不包括把唐诗与唐代其他文体、唐诗与前代或后代文学合论的著作;发表的论文万余篇。这个成绩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各领域中无疑是相当突出的。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有关唐诗研究繁荣的旁证:在近20年时间里,大陆校点出版的唐诗人别集、合集或经

宋元明清人整理、校勘、笺注的唐人诗集近 100 种；现代学者研究唐诗的著作，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闻一多《唐诗杂论》、朱自清《李贺年谱》、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胡云翼《唐诗研究》、苏雪林《唐诗概论》、杨启高《唐代诗学》等都得以单独印行；而五六十年代的唐诗研究著作，其中不少今又重版或经过修订再版，可见唐诗研究之活跃，反映了当代唐诗研究继承传统学术成果、面向世界开阔学术视野。可以说，学术界在唐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唐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斤两相称的。近 20 年的唐诗研究堪称硕果累累，无疑值得我们肯定和骄傲。

历史永远只是一个过程，我们既为已经经历的过去而自豪，更为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未来而摩拳擦掌。20 世纪行将结束，新的世纪正向我们走来，世纪之交是一个反思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刻。为了推进和深化唐诗研究，对新时期 20 年唐诗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在此，我们基于研究唐诗的点滴体会和所掌握的一些学术资料和学术信息，试图对大陆 20 年唐诗研究情况作一概述，并作出初步的估价。我们认为，回顾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把握未来，这当然不足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专史，但是这种总结不仅可以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一部分资料和信息，而且亦可以成为撰著当代学术史之助。

当然，唐诗资料浩如烟海，而我们的见闻有限，故此述评可能挂一漏万，甚至难免有评鹭失当之处，只能求其主要而已。另外还要说明的是，囿于资料，我们对港台和海外汉学界的唐诗研究了解不多，这里也只是对已经介绍到大陆的一些学术成果稍作评述。

现在，且让我们用留恋的心情伴随着我们的目光，去回眸我们用勤勉和智力创造的余温犹在的过去吧。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唐诗综合文献资料的重新研究与整理	(1)
一、唐诗的辨伪与辑佚	(2)
二、诗人生平事迹之考订	(10)
三、唐诗相关历史资料之整理	(16)
四、唐诗语言辞书及文学编年史之编订	(23)
第二章 李白研究	(30)
一、李白全集之整理与诗文系年	(32)
二、李白研究的工具书	(41)
三、李白思想及其诗歌艺术研究之一	(42)
四、李白思想及其诗歌艺术研究之二	(60)
五、李白生平事迹研究	(71)
第三章 杜甫研究	(96)
一、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	(96)
二、关于杜甫思想的研究	(104)
三、关于杜甫生平行迹的考辨	(114)
四、关于杜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120)
五、杜诗分体、分类、分阶段、分地域研究	(133)
六、杜诗学研究	(146)
第四章 王维研究	(186)
一、王维生平问题	(186)

二、王维诗文整理、考订和系年·····	(192)
三、王维思想倾向和诗歌艺术研究·····	(193)
四、研究视野之拓宽·····	(198)
第五章 韩愈研究 ·····	(203)
一、全集整理校笺与资料汇编·····	(203)
二、韩愈生平、思想研究·····	(205)
三、综合研究著作·····	(209)
四、文学主张、诗歌艺术研究·····	(212)
五、诗歌影响及历史地位研究·····	(221)
六、韩学史研究·····	(223)
第六章 白居易研究 ·····	(226)
一、白集的整理、注释与综合研究·····	(226)
二、白居易生平、交游研究·····	(228)
三、思想、诗论、诗艺研究·····	(230)
四、沿革、比较研究·····	(240)
五、白居易其人其诗的海外影响·····	(245)
第七章 李商隐研究 ·····	(247)
一、全集整理笺注·····	(247)
二、综合研究著作·····	(248)
三、生平事迹研究·····	(254)
四、《无题》诗之内涵及艺术特征研究·····	(258)
五、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探讨·····	(264)
第八章 唐代其他诗人研究 ·····	(270)
一、初唐诗人研究·····	(270)
二、盛唐诗人研究·····	(282)
三、中唐诗人研究·····	(290)
四、晚唐及其他诗人研究·····	(310)

第九章 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322)
一、唐诗总体研究与艺术研究	(324)
二、唐诗分期与分阶段研究	(328)
三、唐诗流派与群体研究	(334)
四、多维视野下的唐诗研究	(340)
五、唐诗学的建构	(351)
第十章 学术交流与境外学术成果的引进	(356)
一、日本学者的唐诗研究	(357)
二、美国学者的唐诗研究	(362)
三、港台及其他地域学者的唐诗研究	(367)
四、现状与反思	(371)
第十一章 唐诗普及的新阶段	(373)
一、“三百首”与“三百首”效应	(374)
二、鉴赏辞典与类编、评译热潮	(378)
三、选注本的大丰收	(382)
四、新方法、多角度研究的结晶	(409)
第十二章 新时期唐诗研究的学术特点	(412)
一、由评判而阐释的转变	(415)
二、文史结合传统的重新确认与拓展	(420)
三、选题的多样性与方法的兼容性	(425)
四、史学与诗学方法的同异与分合	(427)
后 记	(430)

第一章

唐诗综合文献资料的重新研究与整理

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其准确性与否直接影响学术研究及其结论的科学性、可靠性。作为对前几十年学风的一种反拨,近20年唐诗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文献资料工作得到充分的重视,一批著名学者投身于资料整理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影响深远的成果。这方面的成果首先应介绍的是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前言”则写于1978年11月),此书收入作者关于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文章27篇,涉及了从唐高宗至唐德宗前期的32位诗人。作者直承现代学者陈寅恪、岑仲勉等人的朴学方法,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订诗人生平,兼及诗坛流派活动情况,颇多发现和创获。正如周勋初所说:“傅璇琮以为研究唐诗必须考查清楚每一位诗人的生平,还应注意群体的活动,因此对于揭示唐诗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学集团和风格流派尤为致意。每立一论,必辑集丰富的资料,驳正旧说的迷误。这在当时来说,确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见周著《当代学术研究思辨》)此书出版于“文革”结束后不久,其独特的选题角度及研究方法、严谨扎实的学风对学术风气的转变无疑起了一个带头作用,对此后的唐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唐诗的辨伪与辑佚

唐诗是唐诗研究的本体。清编《全唐诗》共收诗 49403 首、句 1555 则、作者 2576 人(不计仙神鬼怪等),网罗宏富,确是一部颇具规模的断代诗歌总集。但因成书仓促,存在问题亦很多,诸如漏收、误收、重收,不注出处,编次失当,校勘粗疏,小传舛误,不一而足。书成之时,著名学者朱彝尊即指出其疏漏,并开列《全唐诗未备书目》达 149 种。后经康熙皇帝“御定”,遂终清代 200 年间无人敢议其瑕疵。但早在乾隆时期,日本人市河世宁(旧题上毛河世宁)即利用彼邦文献,辑得《全唐诗逸》三卷,补录散失在日本国的逸诗 66 首、断句 279 则、缺文 6 首,涉及作者 128 人,其中 82 人为《全唐诗》所无。此书成于日本天明八年(1788)以前,而刊行于日本文化元年(1804)。后传入中国,于道光三年(1823)刊入《知不足斋丛书》中。1960 年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全唐诗》、198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本《全唐诗》时,皆将其诗附收于书末。我国当代学者续有辑佚。中华书局将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辑佚成果汇为一编,于 1982 年出版了《全唐诗外编》。全书包括王重民《补全唐诗》和《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全唐诗补逸》20 卷、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 卷,意在辑补中华书局版《全唐诗》(包括《全唐诗逸》)收录之不足。但该书收录佚诗仍未完备,考订亦欠精审,重出、误收、漏收之诗亦复不少,作者传记亦有疏失舛错处。有鉴于此,中华书局特约请陈尚君对《外编》进行一次全面的校订和续补,将王重民《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换用刘修业整理的《补全唐诗拾遗》,仍名《全唐诗外编》,收入《全唐诗补编》,详见陈尚君《〈全唐诗外编〉修订说明》。这里应该特别提出复旦大学青年学者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 1992 年),这是新时期全唐诗资料整

理、研究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这是一部清编《全唐诗》以外的唐人遗诗的总汇性著作,全书共计 125 万字,精装三册,分《全唐诗外编》修订本和《全唐诗续拾》两部分,共收录唐入逸诗 6327 首又 1505 句,作者 1700 多人,其中 900 多人为本书新发现。陈氏历时 10 年,以一人之力先后翻阅了包括四部典籍、金石方志、释道二藏、敦煌遗书、域外善本在内的各种古籍 5000 多种,经过大量复杂而具体的研究、琐碎而严密的考订,始完成这一浩大而艰巨的工程。可谓网罗宏富,考辨亦称精审,体例创新,作家小传之生平行迹多有补正,为研究唐代诗歌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学史料。出版后,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论者称“本书作为近十数年间唐诗研究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显示了中国年轻研究者的坚实素养和认真学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48 册,蔡毅书评)。但《全唐诗补编》并未将全唐逸诗搜罗殆尽。牛林杰《韩国文献中的〈全唐诗〉逸诗考》(《文史哲》1998 年 5 期)一文,发现高丽时期韩国人所编辑的一部唐诗选集《十抄诗》,收录了中晚唐 30 位诗人(包括 4 位新罗人)的作品,全部为七言律诗,每人 10 首,共 300 首。其中温庭筠、许浑、杜荀鹤、方干、秦韬玉 5 人之诗,《全唐诗》皆有收录。其余 21 位唐代诗人都有未见于《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的逸诗,少则 1 首,多则 10 首不等,计有刘禹锡 1 首、白居易 4 首、张籍 4 首、章孝标 10 首、杜牧 1 首、李远 6 首、雍陶 7 首、张祜 8 首、赵嘏 4 首、马戴 10 首、韦蟾 10 首、皮日休 9 首、曹唐 8 首、李雄 10 首、吴仁璧 10 首、韩琮 9 首、罗邺 9 首、罗隐 8 首、贾岛 4 首、李山甫 10 首、李群玉 10 首,共 152 首。尤其如李雄其人,《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都未收其诗。而《郡斋读书后志》卷二载:“《鼎国诗》三卷,后唐李雄撰,雄,洛巩人,庄宗同光甲申岁(924)游金陵、成都、邺下,各为咏古诗三十章,以三国鼎峙,故曰‘鼎国’。”而《十抄诗》录有李雄的《漳水河》、《云门寺》、《秦淮》、《台城》、《江淹宅》、《向吴亭》、《水帘

亭》、《濯锦江》、《子规》、《张仪楼》等 10 首诗,正是其《鼎国诗》中诗。新罗人崔致远所作汉诗,据最新统计为 127 首,《全唐诗逸》、《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拾》共收补崔诗 89 首,尚有 38 首没有补录。而《十抄诗》所收崔致远 10 首诗,除 1 首已见其《桂苑笔耕集》外,其余 9 首皆为逸诗。其余三位新罗人崔匡裕、朴仁范、崔承祐所作 30 首七言律诗,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续拾》只在崔致远诗后附注中录有崔匡裕《长安春日有感》1 首全文。

清编《全唐诗》的误收、重收情况也非常严重。如钱起诗,《全唐诗》共收录 531 首,而据吴企明《唐音质疑录·钱起、钱珣诗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考证:“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明是钱珣(起曾孙)诗的,共有一百二十一首,占全集的 23%。”又如收录唐彦谦诗 2 卷共 180 余首,而据王兆鹏《唐彦谦四十首贻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52 辑)和佟培基有关论著考证,其中 40 首与宋末元初诗人戴表元互见诗皆为戴作,唐彦谦名下非唐作还不止此数,可见《全唐诗》误收率之高。佟培基编撰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更是在总结他人发现的基础上,对《全唐诗》的重出误收诗进行了一次总清理。该书旨在考订《全唐诗》中一诗互见于两家或多家的重出作品,以及误收唐朝以前五代以后之作,兼及唐人间误收之作。全书编次系据中华书局 1979 年版平装本《全唐诗》(包括《全唐诗逸》),以作家为纲,作品为目。凡属重出、误收的作家作品,均依原书编次列入,于诗题后括号内注明所在册数、卷次、页数,后即详加考辨。对历代传刻所造成的歧误,凡能明其归属者,考辨按断是非;难定归属者,列文献资料出处,以资旁证;对学术界意见不一者,分列诸说,以示疑义。意在甄辨歧互,删汰繁芜,去伪存真,态度极为审慎。编撰者博览穷搜,钩沉稽异,用功颇深,所获颇丰,共辑得重出诗 3157 首、句 153 则,误收非唐人诗 863 首、句 25 则;若加上《全唐诗》卷一 0 至二九郊庙乐章及乐府

诗又重出于作家本集中的互见诗 2838 首,那么,重出误收诗总计达 6858 首、句 178 则,涉及 906 家,尚不包括误收诗中的北周弘执恭,隋薛道衡,唐释玄奘及宋何蒙、王禹偁、刘宾、程俱、王安石、朱熹、姜夔、罗大经、周端臣,元萨都刺、虞集、丁鹤年、戴表元,明史瑾、刘崧、张以宁、汪广洋等人。该书实为有关《全唐诗》重出误收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凡研究和阅读《全唐诗》者,不可不读也。一些研究者在作家个案研究和作品笺注整理中,也进行了大量的甄别诗歌真伪的工作。如戴叔伦、殷尧藩、杜牧等人集中误收现象即很严重,李白集中亦混入不少伪作。就在佟著之后,陶敏在《晚唐诗人周繇及其作品考辨》(《中华文史论丛》第 55 期)中,又考出《全唐诗》卷 635 所收周诗 23 首中即有 5 首实系元繇所作。陶敏、刘再华又在《〈全唐诗·牟融集〉证伪》(载《唐代文学研究》第 7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一文中,考定唐无牟融其人,牟融乃东汉人,《全唐诗》卷 467 所收牟融诗一卷计 69 首,实为明人所伪造。陈尚君在《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中,对其发表于 1985 年《文史》24 辑之《〈全唐诗〉误收诗考》一文又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和补充,吸收了他人的新发现,共考及 115 位作者,指出诗 782 首(其中重出 9 首)又 53 句,词 34 首。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还专门编著了《全唐诗重篇索引》(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该室从 1960 年以来,历经数十年的整理研究,编成是书,录重出作品 6000 余首,有关作家 700 余人。索引分为五个栏目,即:作家、相重作家、题目、扬州诗局原刊本和同文书局石印本函册卷页、中华书局排印本新旧版册页。为了便于使用索引,书后还附有“姓氏笔划通检”。此书编纂严肃准确,对深入研究《全唐诗》大有裨益,是研究者必备的重要工具书。因此,它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褒评。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选的《全唐诗简编》(高文主编,孙方、佟培基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也是唐诗研究的重大收获。编

选者历经四载完成此编,从确定体例、甄选篇目,到校定诗篇、补写按考、重写小传,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确实做到了“简”而“全”。出版后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被誉为自《全唐诗》成书以来近 300 年间最具规模和识见的大型唐诗选本。但因《简编》成于 1986 年,限于当时条件,故有误收非唐人诗的情况。

全唐诗资料的综合性整理成果还有: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此书编集唐人选唐诗共 13 种,即:①许敬宗等撰《翰林学士集》;②崔融编《珠英集》;③殷璠编《丹阳集》;④殷璠编《河岳英灵集》;⑤芮挺章编《国秀集》;⑥元结编《箧中集》;⑦李康成编《玉台后集》;⑧令狐楚编《御览诗》;⑨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⑩姚合编《极玄集》;⑪韦庄编《又玄集》;⑫韦穀编《才调集》;⑬佚名编《搜玉小集》。全书较 1958 年 12 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的《唐人选唐诗(十种)》有所变化和改进,一是补充了新材料,如增加了《翰林学士集》,重辑了《丹阳集》、《玉台后集》,重加整理《珠英集》。二是改选了较好的底本,如《河岳英灵集》用接近原编的宋刻二卷本,而不用后起的明刻三卷本;《中兴间气集》、《极玄集》也都改用较早的影宋抄本。三是重新根据有关版本及材料作了校记,改正了原书或过去刻本中的一些错误。本书于各集前都写有《前记》,扼要说明编选者生平、成书时代、价值与存在的问题、版本流传及此次整理情况。可以说,传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基本搜罗完备,为唐诗研究者提供了最接近其本来面貌的唐人选唐诗文本。此编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翰林学士集》,编校时未用今存日本名古屋真福寺的原卷,故有些误字未及订正;《玉台后集》辑本亦有漏辑者。张伯伟编撰《全唐五代诗格校考》(同上)是第一部全面校录整理唐五代诗格的专著,共收录唐初至北宋人所作诗格 28 种:上官仪撰《笔札华梁》、佚名撰《文笔式》、旧题魏文帝撰《诗格》、佚名撰《诗格》、元兢撰《诗髓脑》、佚名撰《诗